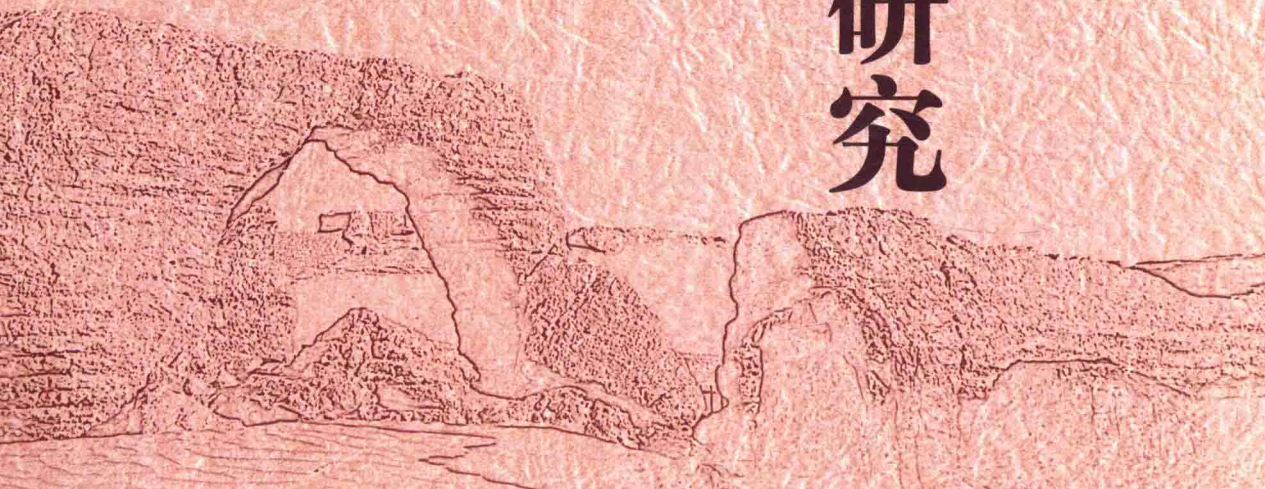


中國藏黑水城
漢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上

孫繼民 宋坤 陳瑞青 杜立暉 等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國藏黑水城
漢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上

孫繼民 宋坤 陳瑞青 杜立暉 等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全三冊／孫繼民等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161-8781-4

I. ①中… II. ①孫… III. ①出土文物—文獻—研究—額濟納旗—西夏
IV. ①K87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96881 號

出版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宋燕鵬
責任校對 石春梅
責任印製 李寡寡

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編 100720
網址 <http://www.cassp.cn>
發行部 010-84083685
門市部 010-84029450
經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刷裝訂 北京君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46.5
字數 2532 千字
定價 568.00 圓(全三冊)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營銷中心聯繫調換
電話：010-84083683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本書為二〇一一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與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前 言

黑水城文獻主要包括俄藏、英藏和中國藏三大宗。1908年至1909年，俄國軍官、地理學家科茲洛夫受俄國皇家地理學會派遣，率探險隊兩次到我國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地區的黑水城進行“考察”，發現、挖掘了大量珍貴的西夏文、漢文文獻和其他文物，並將這些文獻文物運往俄羅斯。這批文物分為文物和文獻兩類，文物部分收藏在俄羅斯國立愛密塔什博物館；文獻部分現存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此之謂俄藏黑水城文獻。繼科茲洛夫之後，英國斯坦因於1914年第三次中亞探險考古期間也曾到黑水城進行盜掘，所獲文獻現存於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此為英藏黑水城文獻。中國藏黑水城文獻則包括以下數次中國考古工作者對黑水城考古發掘所獲文獻：1. 1926年9月中旬，由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和中國北京大學徐炳昶教授組成並共同擔任團長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曾到黑水城考察並獲得部分文書，現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 1962年和1963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兩次派員到黑水城進行考古調查，獲得少量文書，現藏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3. 1978年中國科學院沙漠研究所、人民畫報社、中國報導社、甘肅日報社和甘肅省博物館等單位聯合組成的河西沙漠考察組也曾到黑水城遺址進行考察，在城中的兩個垃圾堆中清理出十多件元代文書。1979年，甘肅省電影製片廠前往黑水城拍攝電影期間，王勤台和陳炳應兩位先生也曾發現少量文書。這兩次考察共獲得文書24件，現藏於甘肅省博物館；4. 1983年和1984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對黑水城遺址先後進行兩次發掘，這是中國考古工作者對黑水城遺址進行的最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所獲文書現分藏於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館和額濟納旗文物管理所。以上數次考古發掘所獲文獻即為目前已知的中國藏黑水城文獻的全部，其中，又以1983年和1984年兩次發掘最為徹底，所獲文獻數量最多，構成了中

2 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國藏黑水城文獻的主體。2008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以全彩印刷的方式出版《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一書，該書收錄了1983年和1984年兩次對黑水城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時所獲漢文文書及1962年和1979年各文博部門採集的少量漢文文書。該書所收錄的漢文文書即是本書整理與研究的對象。

黑水城文獻出土後，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直接結果就是催生了“西夏學”這一新興學科。早期的“西夏學”主要就是指對黑水城西夏文文獻的研究。這一時期由於學界對黑水城文獻研究的興奮點在西夏文文獻上，同時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影印件未公佈，故而學人的關注點均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上，對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研究相對比較薄弱。1983年陳炳應發表《黑城新出土的一批元代文書》一文，^①對1976年和1979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到黑水城調查採集到的文書進行了探討，並公佈了24件文書的錄文及15件文書圖版，這是對中國藏黑水城文獻的首次公佈及最早的研究成果。1983年和1984年兩次考古發掘後，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即着手文書的整理修復，1987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與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在《文物》第7期上發表《內蒙古黑水城考古發掘紀要》，同期發表的還有李逸友《黑水城文書所見的元代納憐道站赤》一文。

1991年李逸友集中發表了《元代文書檔案制度舉隅——記內蒙古額濟納旗出土元代文書》^②《元代草原絲綢之路上的紙幣——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出土的元鈔及票券》^③《黑城出土的元代律令文書》^④等系列文章。同年他還出版了《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⑤一書，該書是對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第一次全面系統的整理公佈，功不可沒。其後，國內諸多學人依據該書的錄文與圖版，發表了數量可觀的相關研究文章。先後發表的論文主要有：李逸友《黑城出土的元代合同婚書》^⑥，《內蒙古醫學史略》編寫組《從出土醫書殘頁窺元代哈拉浩特醫學之

① 《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1期。

② 《檔案學研究》1991年第4期。

③ 《中國紙幣》1991年第3期。

④ 《文物》1991年第7期。

⑤ 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

⑥ 《文物天地》1992年第2期。

一斑》^①，方齡貴《讀〈黑城出土文書〉》^②，張培瑜、盧央《黑城出土殘曆的年代和有關問題》^③，邱瑞中《黑城元代文獻札記》^④，楊選第《元代亦集乃路的民間借貸契約》^⑤，葉新民《亦集乃路元代契約文書研究》^⑥，劉海波《〈黑城出土文書〉醫藥殘文考略》^⑦，劉曉《從黑城文書看元代的戶籍制度》^⑧，聶鴻音《黑城所出〈續一切經音義〉殘片考》^⑨，邱樹森《從黑城出土文書看元〈回回哈的司〉》^⑩，吳宏岐《〈黑城出土文書〉中所見元代亦集乃路的灌溉管道及其相關問題》^⑪，王銘《元代亦集乃路河渠司上總管府具保結呈考辨》^⑫，龐文秀《黑城出土元代有價證券例證》^⑬，虞萬里《黑城文書〈新編待問〉殘葉考釋與復原》^⑭，石昆《從黑水城出土漢文文書看元代亦集乃路的西夏遺民》^⑮，段玉泉《黑水城文獻〈資治通鑒綱目〉殘頁考辨》^⑯，潘潔《黑城分例文書中的属相紀年》^⑰，張玉珍《從黑城出土文書看元代貨幣制度》^⑱，劉秋根、楊小敏《從黑城文書看元代官營酒業的變化》^⑲，潘潔、陳朝輝《元代亦集乃路大王妃子分例文書復原》^⑳，潘潔《元代亦集乃路稅糧初探》^㉑，侯愛梅《失林婚書案文書初探》^㉒，崔為、王姝琛《黑城出土的〈傷寒論〉抄頁》^㉓，徐悅《黑城所出 F116: W115 號提調農桑文

① 《內蒙古中醫藥》1992年第3期。

② 《內蒙古社會科學》1992年第6期。

③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

④ 《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第2期。

⑤ 《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

⑥ 《蒙古史研究》第五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⑦ 《中華醫史雜誌》1998年第2期。

⑧ 《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

⑨ 《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

⑩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

⑪ 《西北民族論叢》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⑫ 《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

⑬ 《內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S4期。

⑭ 臺灣《漢學研究》2003年第2期。

⑮ 《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2期。

⑯ 《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⑰ 《內蒙古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⑱ 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⑲ 《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⑳ 同上。

㉑ 《內蒙古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

㉒ 《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

㉓ 《長春中醫藥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

書考釋》^①，鄭彥卿《黑水城所出一件元代職官文書考釋》^②，王亞莉《黑城文書所見元代兩件站赤文書考釋》^③，潘潔《黑水城出土文書中的記數符號初探》^④，徐悅《元代亦集乃路的屯田開發》^⑤，劉永剛《對黑水城出土的一件婚姻文書的考釋》^⑥，吳超《亦集乃路稅務管理初探》^⑦。同一時期，日本學者也利用《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所公佈文書，結合其他文獻資料，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對此杜建錄在《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前言》中已有詳細列舉^⑧，在此不再一一贅述。

2008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聯合編輯出版了《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一書，該書共收錄了漢文文書4213件，並且採用了全彩印刷，最大限度地體現了文書原貌，保存了文書的原始信息。該書的出版，在學界掀起了一個黑水城漢文文獻研究的小熱潮，先後發表的論文主要有：王亞莉《黑城出土元代簽補站戶文書F116:W543考釋》^⑨，許偉偉《黑城夏元時期契約文書的若干問題——以穀物借貸文書為中心》^⑩，叢海平《〈黑城出土文書〉所見海都之亂時期亦集乃路的軍糧供給》^⑪，吳超《〈黑城出土文書〉所見“牌子”考》^⑫，孫廣文、蘭天祥《元代亦集乃路儒學教育初探》^⑬，潘潔《黑水城出土〈文獻通考〉版本考》^⑭，張重艷《黑水城所出元代軍糧文書雜識》^⑮，楊彥彬《試析元末至北元初期甘肅地區的分省設置——以三件黑城出土文書為中心》^⑯，李治安《元代甘肅行省新探》^⑰，李艷、謝繼忠《從黑城文書看元代亦集乃

① 《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

② 《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③ 《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

④ 《寧夏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

⑤ 《寧夏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⑥ 《寧夏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

⑦ 《陰山學刊》2008年第5期。

⑧ 杜建錄：《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前言》，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4頁。

⑨ 《寧夏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

⑩ 同上。

⑪ 《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⑫ 《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⑬ 《寧夏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⑭ 《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9年第7期。

⑮ 《蘭州學刊》2009年第12期。

⑯ 《西夏學》第四輯，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⑰ 《元史論叢》第十一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路的水利管理和糾紛》^①，楊印民《元代官府祇應酒品的生產與管理——兼與〈從黑城文書看元代官營酒業的變化〉一文商榷》^②，陳瑋《元代亦集乃路伊斯蘭社會探析——以黑城出土文書、文物為中心》^③，杜立暉《黑水城 F116: W434 元末簽補站戶文書試釋》^④，孔德翊、屈耀琦《元代亦集乃路祭祀初探》^⑤，張笑峰《聖容寺研究——以黑水城出土文書為中心》^⑥，潘潔《元代亦集乃路賦稅考——黑水城出土稅票考釋》^⑦，吳超《〈黑水城出土文書〉所見亦集乃路達魯花赤》^⑧《元代勸農機構初探——以黑水城出土文書為中心》^⑨《黑水城出土文書所見人事變化初探》^⑩《〈黑水城出土文書〉所見亦集乃路農業技術推廣初探》^⑪，彭海濤《黑水城所出八件佛經殘片定名及復原》^⑫，蔡偉政《黑水城所出元代禮儀祭祀文書初探》^⑬，屈耀琦《元代亦集乃路的國家祭祀——以黑城出土文書為中心》^⑭，趙小明《中國藏黑水城方術類文獻研究》^⑮，邱志誠《黑水城文書中發現又一版本的〈千金要方〉——新刊中國藏黑水城 F14: W8 號漢文文書考釋》^⑯，蘇力《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字學補證》^⑰，吳超《蒙元時期亦集乃路畜牧業初探》^⑱《〈黑水城出土文書〉所見亦集乃路的孤老救濟初探》^⑲，劉廣瑞《再考黑城所出 F116: W115 號提調農桑文卷》^⑳《黑水城所出元代解由文書初探》^㉑《黑水城所出元代“白帖”文書初釋》^㉒，楊富學、張海娟《蒙古

-
- ① 《邊疆經濟與文化》2010 年第 1 期。
 ② 《寧夏社會科學》2010 年第 1 期。
 ③ 《西域研究》2010 年第 1 期。
 ④ 《寧夏社會科學》2010 年第 4 期。
 ⑤ 《西夏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⑥ 同上。
 ⑦ 《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⑧ 《陰山學刊》2011 年第 2 期。
 ⑨ 《西夏研究》2011 年第 3 期。
 ⑩ 《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3 期。
 ⑪ 《農業考古》2011 年第 4 期。
 ⑫ 《西夏學》（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⑬ 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
 ⑭ 寧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
 ⑮ 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
 ⑯ 《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1 期。
 ⑰ 《東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1 期。
 ⑱ 《農業考古》2012 年第 1 期。
 ⑲ 《西夏研究》2012 年第 1 期。
 ㉑ 同上。
 ㉒ 《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012 年第 2 期。
 ⑳ 《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2 期。

爾王家族與元代西北邊防》^①，陳瑞青《黑水城所出元代甘肅行省豐備庫錢糧文書考釋》^②，郭兆斌《從黑水城出土文書看元代的肅政廉訪司刷案制度》^③，霍紅霞《元代亦集乃路水利管理初探》^④，杜立暉《黑水城文書與元代錢糧考較制度》^⑤，邱志誠《黑水城 M1·1296、M1·1298 號文書的綴合、考釋及相關問題研究》^⑥，孫繼民《黑水城文獻所見元代肅政廉訪司“刷尾”工作流程——元代肅政廉訪司文卷照刷制度研究之一》^⑦，陳瑞青《黑水城元代文獻中的“安定王”及其部隊》^⑧《〈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印本古籍殘片題名辨正》^⑨《〈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所收佛經殘頁題名辨正》^⑩，馬立群《黑水城出土婚姻類文書探析》^⑪，陳朝輝、潘潔《黑水城出土元代文書押印制度初探》^⑫，郭兆斌《元代肅政廉訪司研究——以黑水城出土文獻為中心》^⑬，薄嘉《黑水城出土元代諸王妃子分例文書整理與研究》^⑭，劉廣瑞《元代千字文編號應用形式考——以黑水城文獻為中心》^⑮，王天然、馬楠《黑水城出土刊本〈尚書句解〉殘葉小識》^⑯，邱志誠《黑水城 M1·1221、M1·1225 漢文文書殘片考釋》^⑰，宋坤《黑水城所出識認狀問題淺探》^⑱，張磊、黃訢青《黑水城所出元建本〈碎金〉殘頁研究》^⑲，張笑峰《黑水城文書中的寧肅王》^⑳，秦樺林《黑水城出土〈元一統志〉刻本殘葉考》^㉑，張國旺《黑水城文書所見元代地方官吏俸

①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

② 《寧夏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

③ 同上。

④ 《農業考古》2012年第4期。

⑤ 《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⑥ 《文獻》2012年第4期。

⑦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⑧ 《南京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⑨ 《薪火相傳——史金波先生70壽辰西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

⑩ 《“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與研究研討會”論文集》，2012年8月，煙台。

⑪ 《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2年第11期。

⑫ 《西夏研究》2013年第4期。

⑬ 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⑭ 同上。

⑮ 《檔案學研究》2014年第1期。

⑯ 《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年第2期。

⑰ 《寧夏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

⑱ 《西夏研究》2014年第3期。

⑲ 《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4年第6期。

⑳ 《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4年第7期。

㉑ 《中國地方志》2014年第10期。

額考論》^①，杜建錄、鄧文韜《黑水城出土兩件租賃文書考釋》^②，杜建錄、鄧文韜《黑水城出土合同婚書整理研究》^③，張海娟《黑水城文獻與蒙元史的構建》^④，杜立暉《元代勘合文書探析——以黑水城文獻為中心》^⑤，侯愛梅《從黑水城出土文書看元代亦集乃路的司法機構》^⑥，等等。

二

中國藏黑水城文獻相對於俄藏、英藏黑水城文獻來說具有兩大顯著特點：一是漢文文獻居多，占主體地位。俄藏為黑水城文獻的最大宗，1963年戈爾芭切娃和克恰諾夫編《蘇聯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藏西夏文寫本和刊本考定書目》收錄的文獻編號是8090號，其中西夏文文獻占90%。漢文文獻的數量，1984年孟列夫編《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收錄的是488件；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合作整理的《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六冊收錄的文獻有636個編號，僅占全部文獻的7%。英藏部分，據謝玉傑《英藏黑水城文獻·序言》稱：雖然斯坦因在其考古報告中說只有“西夏文寫本1100件，西夏文印本300件”，但“實際上現有英國國家圖書館西夏文獻的編號4000號以上”。而其中之漢文文獻據統計共計406個編號^⑦，僅占10%左右。而《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一書共收錄漢文文獻4213件（2000多個編號），占全部文獻的四分之三以上。^⑧二是世俗文獻居多，且全部為元代文獻。從文獻種類來看，俄藏及英藏黑水城文獻當中，90%以上均為佛教文獻；從朝代構成來看，俄藏、英藏文獻當中共含宋、夏、遼、金、元等諸朝文獻，且俄藏當中還包括有混入的清代文獻。^⑨而中國藏黑水城4213件漢文文獻當中，佛教文獻僅233件，約占5.5%；朝代構成當中，雖然《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一書《凡例》中稱

① 《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② 《宋史研究論叢》（第十五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③ 《西夏研究》2015年第1期。

④ 《敦煌研究》2015年第1期。

⑤ 《歷史研究》2015年第2期。

⑥ 《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8期。

⑦ 白寧寧：《英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整理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⑧ 杜建錄：《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前言》，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頁。

⑨ 孫繼民：《黑城學：一個更為貼切的學科定名》，《河北學刊》2007年第4期。

文獻收錄範圍包括“宋、遼、夏、金、元時期的紙質漢文文獻 4213 件”，但實際上該書所收文獻均屬元代文獻，未見其他諸朝文獻。

雖然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朝代構成單一，均為元代文獻，但其文獻價值並不低於俄藏、英藏文獻。在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當中，元代文獻最多，占據主體地位。據統計，《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有元代文獻 80 件，英藏黑水城文獻中，郭鋒《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佈的部分》一書中所刊佈的 106 件漢文文書中，除了 2 件可以判定為西夏文獻、1 件為宋代文獻，9 件為元代文獻外，其餘未確定朝代的絕大部分文獻也應為元代文獻。《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刊佈的 650 多件文獻中，編者沙知先生確認的元代文獻是 149 件，其未確定年代的文獻也多為元代文獻。陳炳應《黑城新出土的一批元代文書》刊佈甘肅博物館收藏的黑水城文獻為 24 件，其中 23 件為元代文獻。中國藏元代文獻是 4213 件（2000 多個編號），則元代漢文文獻在黑水城文獻中至少有 4438 件。這一數量當然不及西夏文獻，但也占到了黑水城文獻總數 31% 強。相對而言，元代文獻的有效值不及西夏文獻，因為元代傳世資料遠多於西夏的傳世資料；但元代文獻的有效值超過宋代文獻，因為元代傳世資料遠不及宋代的傳世資料豐富。另外，俄藏、英藏所收漢文文獻大多殘損嚴重，幾乎均為殘片，而中國藏黑水城文獻中存在一定數量的完整文獻，其蘊含信息及價值普遍高於俄藏、英藏文獻。大體而言，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價值及意義主要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為研究元代歷史提供了諸多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當中有諸多以前僅見於史籍記載，實物早已湮沒無存的珍貴資料。例如第 2 冊及第 9 冊所收錄的 HF193A 正《廣積倉支黃米文書》、HF193A 背《廣積倉支黃米文書》、84H·F13:W70/0421《押印》、F111:W54《天字號收米文書》、84H·F111:W13/1091《楊三寶收米文書殘件》等幾件文書，杜立暉即研究指出其分別為元代勘合及勘合元發半印號簿原件。^① 據此，我們可以看到元代勘合文書，實由“半印勘合”與“半印勘合號簿”兩部分構成，且其存在漢蒙雙語勘合和漢語勘合兩種形式，其上除載有用於勘驗的字號、印章之外，還載有其他需辦理事務的內容。同時，利用這幾件勘合原件，我們還可以對元代勘合的製作、管理、使

^① 杜立暉：《元代勘合文書探析——以黑水城文獻為中心》，《歷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用流程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彌補了史籍記載的不足。又如，目前學界對元代牌符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做官底牌子及遣使牌子兩類，但對在地方行政運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信牌則關注較少。而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至少收錄有 5 件元代信牌文書，其中較為完整的三件當為與信牌一起使用的“粘連文字”文書原件。這幾件文書原件均體現出了諸多傳世典籍所不載的重要特徵，對於研究元代的牌符制度有着重要史料價值。再如，第 6 冊《票據》類所收錄的元代廣積倉倉票、契本、鹽引等原件，均是研究元代經濟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第二，為認識元代公文形態和文書管理、流轉運作提供了珍貴資料。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當中共收錄有文卷 17 種，涵蓋農政、錢糧、諸王妃子分例、詞訟、站赤、祭祀六大類。文卷當中內容豐富，是研究元代文書管理、流轉制度的寶貴資料。例如，第 2 冊《大德四年軍糧文卷》中 F116: W552 號文書，由圖版可見，此件文書是由 3 紙粘貼而成。前兩紙紙張相同，內容為一完整文書，敘述了事由、事目項及首領官簽押，並加蓋墨印，在此兩紙粘貼處也加蓋了墨色騎縫章，其目的應為防止有人私自揭改文書。而最後一紙較小，為另紙粘貼，有 3 行朱書，內容為肅政廉訪司勘驗文書後所留處理意見，最後為肅政廉訪司官吏署名畫押，並加蓋朱色印章及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木刻照刷戳記。這些信息極為重要，它們可以使我們對元代文書的形成、檢核制度及用章制度有更加真實、更加深入的認知。除文卷之外，其他單件文書對研究元代文書制度同樣有着重要價值。例如，傳世文獻中雖然不乏元代圓署制度的記錄，但圓署完成後的公文形態到底如何卻無從知曉，而第 4 冊《驅口案》所收錄 T9: W3 號文書《宣光元年強奪驅口案》正好彌補了這一缺憾。通過這件文書可知，北元時期的亦集乃路總管府圓署公文至少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圓署的事由，第二部分是長官、佐貳官的簽名。其中，圓署事由處鈐蓋印章，長官、佐貳官的簽名順序則先佐貳官，後長官，且有兩處印有八思巴文墨印，這對於認識元代和北元時期圓署公文的形態，進而深入研究圓署制度的運作均有重要價值。

第三，為研究元代地方行政制度、行政機構的運轉提供了具體的細節材料，具有重要的補史價值。中國藏黑水城元代漢文文書主要為亦集乃路總管府及其司屬與甘肅行省的往來文書，這些文書展現出了諸多傳世典籍所未載的細節內容。例如文書中所涉及的“亦集乃分省”問題，傳世典籍中雖然有關於分省的記載，但對元末及北元初期，甘肅地區的分省設立情況則記載不明。而楊彥彬就以 3 件

黑水城出土的漢文文書為中心，對元末至北元初期甘肅地區的分省設置情況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通過3件文書可以看出，至正末年及北元初期，甘肅地區設有肅州分省、甘州分省、亦集乃分省三個分省，其中亦集乃分省設立時間應為洪武五年（北元宣光二年，公元1372年）。^① 由此可見，黑水城漢文文書對於研究元末分省制度的產生、發展、消亡，分省與路的關係，分省的職能、職官制度等內容，提供了翔實史料，這也為研究其他地方的分省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又如，傳世典籍中對於元代分封各地諸王的分例管理制度雖有記載，但也大多語焉不詳。而《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第3冊所收錄的“諸王妃子分例文卷”則為我們研究地方諸王的分例制度提供了重要資料。通過復原其中的“桑哥失里大王分例文卷”，我們可以對元代諸王分例的申請、管理、發放有更進一步的深入認識。

第四，為研究元代的軍事、經濟、法律、教育等問題提供了新材料。例如，叢海平就根據第2冊《大德四年軍糧文卷》並結合傳世史料，對元代海都叛亂，諸王大軍平叛之時的行軍路線、軍糧籌措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通過文書可見，亦集乃路作為元代西北納憐道必經之路，也作為元軍經甘肅一帶前往漠北的必經之路，在籌措轉輸軍糧、供應北邊大軍補給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② 又如，元代賦稅制度，僅在《元史》《元典章》《通制條格》等典籍中有所記載，內容簡短，且多為國家政令，各地的具體實施情況少有涉及，很難反映出賦稅制度的複雜性，尤其是地區差異性。亦集乃路地處偏遠，史籍當中的相關記載幾乎是一片空白。而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當中卻藏有大量倉票等賦稅徵收的第一手資料，對研究亦集乃路的賦稅和農業具有極高史料價值。潘潔即曾通過分析黑水城出土的稅糧文書，對元代亦集乃路地區的稅糧種類、稅率、發放稅票的機構和官員、承擔賦稅的戶計等一系列史籍中沒有記載的問題進行了補充和探究。^③ 再如，元代的“告攔狀”留存極少，而第4冊《麥足朶立只答站戶案卷》及F116:W98號文書《陳伴旧等爭地案》則為兩件“告攔狀”原件，據此我們可以對元代的告攔文狀進行具體考察，可由此探討告攔狀的具體程式，加深對元代

① 楊彥彬：《試析元末至北元初期甘肅地區的分省設置——以三件黑城出土文書為中心》，《西夏學》（第四輯），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叢海平：《〈黑城出土文書〉所見海都之亂時期亦集乃路的軍糧供給》，《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③ 潘潔：《元代亦集乃路賦稅考——黑水城出土稅票考釋》，《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1期。

告攔的整體認識，進而加深對元代法律訴訟當中調解機制的進一步研究。

第五，補充了元代刊刻古籍版本的新材料。陳瑞青《〈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印本古籍殘片題名辨正》^①一文指出《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第7冊共收錄古籍殘片23種，其中經過編者定名的只有《文獻通考》《碎金》《孟子》《尚書》《孝經》《薛仁貴征遼事蹟》《新編待問》7種，經過考證，陳瑞青又認定了《孟子集注》《小學》《三國志》《資治通鑒》《稽古錄》《柳河東集》《指南總論》《折獄龜鑿》8種，使中國藏黑水城漢文古籍殘片大部分得以認定。另外，第4冊當中還收錄有《大元通制》《至正條格》《洗冤錄》3種刻本律令古籍，計此則中國藏黑水城文獻當中共收錄古籍殘片26種。由此可見，中國藏黑水城文獻中古籍版本種類之豐富，涵蓋了儒家典籍、史籍、文集、醫書、司法著作等類型。雖然其中的大部分古籍均為殘片，但其仍都具有着重要的版本價值。例如，《折獄龜鑿》在黑水城地區的發現，足以證明該書在元代基層社會的流行程度。同時，其還提供了此書的最早版本。又如，虞萬里曾指出第7冊所收F90: W1、F90: W2、F90: W3、F43: W1 4件殘片為元袁俊翁《四書疑節》一書之部分內容，其書之全名當是《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應為元至治原刊本，且F90: W1號文書及F90: W2號文書第1—7行內容不見於現存抄本及四庫本，很可能係“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而章內所言似有及於修身平天下之事何邪”一問之答語。倘此推測不誤，則知四庫本、抄本漏脫“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而章內所言似有及於修身平天下之事何邪”一問之全部答語，以及“所藏乎身不怨何不言忠”之題目和自“忠者怨之體”至“蓋子貢口”之答語三百五十字。^②由此可見黑水城本《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之彌足珍貴。另外，黑水城還出土了4卷58面《文獻通考》，據潘潔考證應為西湖書院泰定元年初刻本^③，該刻本的發現，為研究《文獻通考》的版本流傳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當然，以上有關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資料價值的闡述未免掛一漏萬，相信以後隨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其資料價值將越來越為人們所認識。

① 收於《薪火相傳——史金波先生70壽辰西夏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

② 虞萬里：《黑城文書〈新編待問〉殘葉考釋與復原》，臺灣《漢學研究》2003年第2期。

③ 潘潔：《黑水城出土〈文獻通考〉版本考》，《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9年第7期。

三

如上所述，目前學界有關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系統整理的著作主要是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和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聯合編纂的《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兩書。

《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一書是對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進行系統整理和介紹的第一部著作，由科學出版社於1991年出版。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為“黑城出土文書綜述”，對黑水城出土文書概況以及亦集乃路的居民和建制、農業和商業、財政經濟、站赤、社會情況、儒學和文化、宗教信仰及其他、元代的詔敕律令、票引契券、北元初期的新史料等十一個方面的內容進行了綜合介紹；下篇為“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公佈了黑水城出土760件漢文文書的錄文，另附191件文書黑白圖版。另外，該書除對文書進行釋錄之外，還對文書的用紙、殘存、筆體、尺寸及簽押用印等情況進行了簡要介紹。李逸友的上述整理是這批漢文文獻首次面向學術界的系統介紹，其貢獻和價值不可低估。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10卷無疑是目前整理中國藏黑水城文獻的最重要成果。它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公佈了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的絕大部分文書圖版；二是採用全彩印刷，最大限度地展現了文書原貌，保存了文書的原始信息，為研究者利用文書以及開展進一步深度整理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和《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有關文書的整理，無疑為學術界利用這些新資料提供了方便，也為推動黑水城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做出了貢獻，應該充分肯定。但是，也應該實事求是地指出，以上兩項成果也由於本身體例和客觀條件的限制，存在種種不足。例如，受到時代及技術的限制，《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一書即存在着如下不足：首先，該書僅選錄了4000餘件漢文文書中的760件，不到全部文獻的五分之一，數量較少，缺乏完整系統性；其次，該書後附文書圖版僅191件，其餘均只有錄文，造成大部分錄文不能根據圖版校勘核對，無法糾正李逸友錄文中的誤釋、誤錄；最後，該書所附文書圖版均為黑白圖版，且限於當時印刷技術，圖版模糊不清，造成文書所使用的紙張、印章及

書寫筆跡、墨色等當中所蘊含的豐富史料信息均無法得到有效體現。這些不足在《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改正，但是《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也存在着某些缺憾。例如《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由於其所公佈的均為文書圖版，尤其是元代寫本文書圖版字體多為行草，再加上某些雙面書寫文書中背面文字墨跡的透墨，一般讀者閱讀起來非常困難，必須借助於專門整理者的錄文。《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中所釋錄的文書僅占全部的18%左右，絕大部分文書均無錄文。另外，《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當中所收錄文書圖版也有所缺失。據筆者對照《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統計，在李逸友收錄的760件文書當中，有下列文書，《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未加收錄：

1. 禮儀類“F116:W31”號文書的第一件殘片（《黑城出土文書》第95頁）；
2. 農政類“F277:W55”號文書（《黑城出土文書》第102頁），此文書正背兩面均有文字，背面錄文見《黑城出土文書》第189頁契約類；
3. 提調農桑類“F116:W300”號文書第2件殘片（《黑城出土文書》第102頁）以及“F116:W534”號文書（《黑城出土文書》第104頁）；
4. 賦稅類“F214:W1”（《黑城出土文書》第110頁）和“F9:W31”號文書（《黑城出土文書》第112頁）；
5. 俸祿類“F150:W10”號文書（《黑城出土文書》第124頁）；
6. 盜賊案“F155:W10”號文書（《黑城出土文書》第150頁），此為書信類“F115:W10”號文書的背面文字；
7. 也火汝足立崑地土案文卷“F116:W24”號文書的第2件殘片（《黑城出土文書》第162頁）；
8. 提調站赤類“F135:W19”號文書（《黑城出土文書》第172頁）；
9. 票據類“F1:W38”和“F126:W2”號文書（《黑城出土文書》第183頁）；
10. 府學類“F39:W1”號文書第1件殘片（《黑城出土文書》第195頁）；
11. 封簽及包封類“F135:W21”號文書（《黑城出土文書》第203頁）；
12. 佛教徒習學本“F191:W102”（《黑城出土文書》第213頁）和“F79:W7”號文書（《黑城出土文書》第214頁）；
13. 佛經抄本“F13:W11”（《黑城出土文書》第220頁）、“F20:W3”號文書（《黑城出土文書》第221頁）；